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第376期

13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7年9月6日

“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

■洪子诚

周志文先生是台大中文系教授，也是台湾知名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他谈音乐的书《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2014年10月由台北印刻出版社出版。现在，经作者做了修订，并改换调整插图之后，不久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

2014年下半年，我正好在台湾的清大中文系上课，收到周先生托黄文倩转交的赠书。我很喜欢这本书，有几次旅行都带上它。去年在东北一所大学演讲，还向周先生读了里面谈许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段落。许纳贝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钢琴家。因为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他的贝多芬、舒伯特奏鸣曲唱片几乎都是单声道。周先生说，这“丝毫不减损它庄严伟大”，并举例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对许纳贝尔的盛赞为证。伯林说，许纳贝尔30年代在伦敦演出的音乐会，他和他的朋友场场必到：“是他培养了我们对他音乐的欣赏力，……他对我们贝多芬和舒伯特的诠释改变了我们对古典音乐的看法。”周志文接着写道：

许纳贝尔早死了，以赛亚·伯林也刚过去。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总有些已逝的人，已过的往事让你想起。想起以赛亚·伯林，他的书就在案头，随时可以翻开来看，想起许纳贝尔，我抽出一张他演奏的唱片来听……“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我跟学生说，这说出了我们在读一本好书，听一段动人乐曲，看一幅喜欢的绘画时，那种温暖，那种幸福感的真谛：意识到生命是无根的浮萍，生活和精神因为获得深厚的历史关联而充实、稳定。

《冬夜繁星》是谈音乐的，但音乐不是周志文的专业。周先生先后在淡江大学和台湾大学任教达25年，讲授明清文学、明清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在此之前，当

过中学教师，兼职几家报纸的主笔，出版过小说集，也是台湾知名的散文家。古典音乐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爱好；当然，这个“爱好”不是一般性的，有很多的投入，很长的“资历”。他积累了丰厚的体验，愿意将他的感受、见解跟我们分享。他无意写有关音乐的论著，这本书也不是有关古典音乐的知识性读物。他以随笔的方式，谈他感兴趣，有独特见解，同时在音乐史上有意义的题目，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巴哈的宗教音乐和键盘“俗曲”，大提琴的希伯来哀歌，慢板，帕格尼尼主题，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指挥家阿巴多……它们之间并没有“体系性”的结构安排。

周先生在书里用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俗语。我想，资深的爱乐“内行”相信能从《冬夜繁星》获得对话、切磋的乐趣，而我这样的，虽喜欢却仍“外行”的人说，这本书就有引领你靠近“门道”的“导读”性质。你曾有的感受可能在这里找到印证；你对一些作曲家和曲子的认识，因它的解说得到提升；最多的情况则是，从里面得知你原先不知道，或没有留意的方面。譬如，你会赶紧去找原先不在意的，里赫特的贝多芬第32钢琴奏鸣曲1991年现场版CD来听，因为周先生说，“很少人能够把握这首曲子的精髓”，像他“那样婉约、那样浩荡、那样淋漓尽致”地表现那种高雅和超凡入圣。

《冬夜繁星》的好处，又不仅是对谈到的音乐家、乐团、和录制的唱片的见解，还在如何亲近音乐的态度和方法上给我们的启发。这一点，书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

……其实有关艺术的事，直觉得很重要，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谛。所以我听音乐，尽量少查数据，少去管人

家怎么说，只图音乐与我心灵相对。但讨论一人的创作，有些客观的材料，也不能完全回避，好在音乐听多了，知识闻见也跟着进来，会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因此书中所写，也不致全是无凭无据的。

比起文学、绘画作品，音乐的形制和接受方式远为复杂，如果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需要在知识等方面有更多的准备。因此，“外缘性”知识不是可有可无。这包括音乐史，作曲家传记，时代背景、音乐观念变迁、乐器的变化、各种乐曲体裁的形态结构、现代乐团组织和演奏家的风格、唱片的音效和评鉴标准……那怕是气候、柴可夫斯基的孤独绝望，相信也与他生活的圣彼得堡的阴冷有关。因此，周先生说，“那些出身阳光之国的人”，在演绎他的作品的时候，“老是拿捏不准，不是过于兴奋，就是哀伤过度，能真正把握准确的，我以为只有穆拉文斯基(Evgeny Mravinsky, 1903-1988)”。外缘知识，还包括广泛的人文素养。在《冬夜繁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这方面的深研，如何影响、深化他对乐曲的解读。

不过，确实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谛”。对于爱乐者来说，周先生的提醒是重视“直觉”，要“与心灵相对”。这自然不是否认知识，只不过是“知识”要由心灵去组织，融会贯通，让它们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不然的，就只是一些碎片，人成为这些“知识”碎片，以及试听器材的奴隶。这里提出了阅读者、视听者与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知识等如何参与推动爱乐者“自主意识”的确立。“与心灵相对”，在《冬夜繁星》的音乐解析中，既指用聆听者以心灵去感受，也指感受乐曲(也是作曲家与演奏者)中心的搏动，生命的气息，

而后，这种感受、发现，也就“不知不觉中已渗入我肌肤骨髓，变成我整体生命的一部分”，影响着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响到人的气质、情感、思想境界，如同在听了孟许指挥的柏辽兹《安魂曲》之后，“(我)深受震动，才知道孔子在齐闻《韶》之后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给孔子的感应不只是快乐，所以文中的“乐”字要念成音乐的乐，是指生命必须与艺术结合后，才觉察出它的丰博与深厚。

由于个体心性的差异，爱乐者和音乐建立的关系自然也千差万别，对乐曲，同一乐曲的不同演绎的选择和评价也不会一律。在周志文先生爱乐词典里，人文精神内涵、旺盛生命力、灵性光辉，自我探索的沉思、内省深度词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衡量的首要标准。他不是很在意外表的妍媸，看重的是“强烈的内在动力”。也就是“借着乐音的提示”，让我们思考、体会“世界之广之深，了解人性之丰富多变”；艺术的伟大，往往在提供这种可能，音乐也如是。由是，周先生认为，称贝多芬为“乐圣”，“应该不是他创作了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也不是他的《D大调庄严弥撒》，而是他有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显然，他对“伟大”一词有自己的见解，以至在给作曲家颁发这一头衔上相当苛刻、吝啬：“伟大”的贝多芬之后，谁可跻身这一行列？在犹豫地列举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萧邦、李斯特而又放弃之后，才选择了勃拉姆斯。而像勋伯格(Harold C.Schonberg)这样的批评家，进入“伟大”行列的，就有自蒙特威尔第、巴赫，到20世纪的勋伯格、梅西安等几十名(《伟大作曲家的生活》)。对在大陆昵称为“老柴”的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周先生多少也有些不敬(虽然也称道他的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也是，他的一些曲目，“偶尔听听觉得很

好，听多了，或放在一块儿听，便让人受不了，总有些腻的感觉。”至于“对比强烈”的古尔德的巴赫，虽说风靡一时，却持有保留态度，“古尔德的几次录音抢尽风头，不代表巴赫在键盘音乐的表现仅在于此”，他“音乐中严谨的秩序、对称与和谐，往往要从别的录音中寻找”……但是，这些大多不是属于“对”“错”的范畴。

《冬夜繁星》对音乐的个性鲜明的评述，可能会让我们忽略另一出色的方面，就是它在散文写作上提及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总编辑初安民对朱天文说，周志文的散文集《同学少年》，是十年来所见最好(不是最好之一)的文章(《见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我对台湾这些年的散文创作缺乏全面了解，无法做出比较。但《冬夜繁星》的文字确实是好；借用周先生的话，这“好”不是外表的妍媸，而是深挚的内涵。“知性”往往是学者散文的特征。《冬夜繁星》的“知性”表现，却是朴素平易。没有居高临下，也不以“高深”来吓唬人。书面语和日常口语的没有芥蒂的结合，也极有韵味；“该平实之处平实，该绚烂之处绚烂”。有时候会没有顾忌地盛赞所喜欢的，如说卡尔·伯姆1971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终合唱之前的“如歌的慢板”是“好到令人灵魂出窍的无懈可击的地步”；但又知道节制。将他评议里赫特的钢琴演奏的话——“将他的热情把握得恰如其分，他不会伸展不开，也从来不会‘滥情’”——转用来评周志文的文字，也应该妥当。

“节制”“克制”这些词，总意涵着自我压抑的意志成分。而最高的境界是出于自然，没有勉强和刻意。这是语文修养，也是人生态度的体现；明白事情的发生和事物的情状，总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也明白，“自我”之外，还有他人，还有广

大的世界。周先生在另一处地方说过，天文学知识和大量的文学艺术，“让我知道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既是渺小而微不足道，又伟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与其这样唠叨下去，不如读读周先生的文字。请看他是怎样写莫扎特的吧：

他的风和日丽是天生的，他的气度不是靠磨练或奋斗得来。……既没有外在的敌人，也没有内心的敌人，所以可以放松心情，无须作任何防备，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多么难得的经验啊。孟子说内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未闻。中国人习惯过内外交迫、戒慎恐惧的生活。莫扎特告诉我们无须如此紧张，他悠闲得有点像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但陶渊明在辞官归里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火气，“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不像莫扎特，他的音乐云淡风轻，快乐中充满个人的自信与自由。

他的艺术是把一切最好的可能表现出来，没有不及，更没有任何夸张，好像那是所有乐器的本来面目，圆号(Horn)本来就那么亮丽，长笛(Flute)就是那么婉转，巴松管(Bassoon)就该那么低沉，竖琴(Harp)就该那么多情，双簧管(Oboe)就该那么多辩，……莫扎特的世界阳光温暖，惠风和畅，天空覆盖着大地，大地承载着万物，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仔细听，好像没有任何声音，而所有声音其实都在里面，没有压抑，没有抗拒，声音像苏东坡所谓的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因为不择地皆可出，所以十分自由。

这样说来，莫扎特无疑是“神人”了。怪不得神学家卡尔·巴特说：“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然后才打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施莱格勒的所在。”(《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挪威书镇印象

■应奇

今年五月初的某天晚上，有一位书迷在他平日栖居的千岛新城例行散步时，偶然在本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新华社的消息，报道的是位于挪威西部的一个名为菲耶兰德的小镇，因为那里有一个挪威最大的二手图书市场，这个小镇就被称作书镇。这个报道还配发了一张图片，图上是名读者正在两旁排高及屋顶的书架间专心挑书。这则报道和这张图片显然打动了万里之外的这位书迷。也是无巧不成书，刚好这位书迷得到留学基金委的支持，将在八月访问卑尔根大学，于是他就暗暗发愿：到了挪威之后，一定要到这个书镇一游，以一尝在书镇寻书之乐。

八月上午的一天，这位书迷和他在卑尔根大学研修的一位学生，连同哲学系的另外两位博士生一起，结伴到位于长达二百多公里的松恩峡湾尽头一个名为肖顿的小镇，探访维特根斯坦当年在那里建造的小木屋遗址。这位奥地利哲学家对于挪威之情有独钟，几乎已经成为一个传奇。经过五六个小时的奔波，来到肖顿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们当晚就住在哲学家的朋友平森特当年留下过一张照片的瀑布旁的小木屋里，闻瀑声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登上了位于峡湾终结处一片湖水之绝壁上的那个传说中的故居遗址，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只有看上去是用嶙峋的乱石堆成的地基尚存。站在那些几乎是凌空

的坚石上，寻觅着当年船到湖

边后运石上山的早已湮没的小道，相隔近百年，哲学家那种绝尘斩截的姿态似乎依然栩栩如在眼前。

从上山下来后，一行人就驱车直奔书镇而去。下午两点左右，这行人就在阴雨绵绵中来到了这个若没有到过就断难想象的所在。菲耶兰德其实是个普通的小村子，村子里一共也就二百多号人。但这个村子的地形很特别，它四面环山，左右两侧和村背后都是雪山，北侧是挪威最高最大的雪山和冰川，南侧则有一道峡湾从远望望去有些紧锁的岬口蜿蜒而入。村子前面是太阳从其背后升起如屏障似的一座纵贯山脉，横亘在这座山脉和村子之间的是延伸和摆荡到此为止的峡湾，给人感觉像是村子前面的一条宽阔的溪水。在沿山脉下端铺展的南北向的公路打通之前，这个村子本来是一个规模不小的码头，那时从北边过来的旅行到此村子后就必须改走水路，就如同从南面水路进来的旅行到此后就

必须改走陆路。公路贯通之后，码头的转运功能就逐渐废弃了，据说现在书镇上最大的那家书店所在的那个位置就是当年的候船室。至于这个书镇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书镇所免费分发的小手册中并没有确切的说明。有的说法是这里的村民有在晴天户外晒书的习惯，慢慢地这个村子就成了附近的书籍集散地，并逐渐辐射到更远的周边，于是后来就开始显现“品牌”效应，从而形成了目前的格局。但是，说它是书镇，似

乎又并没有什么商业气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据后来一位在书镇上班的中年女士告知，或许在于书镇的书主要来自捐赠，就是说，“货源”而论，几乎没有有什么成本可言，这应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其书价之“低廉”。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景致”是，村子中有些人家即使没有开书店，家门口也都放着几个小书架，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式书籍，当然多是二手的文学书，基本以通俗小说为主。书迷初见时不禁疑惑：难道他们到现在还在晒书吗？后来才弄清，这些书架旁边都挂着一个布袋，上面写着取走一本书请往布袋里投入五克朗或十克朗之类的，其可谓“老少无欺”“路不拾遗”之古风犹存乎？

在菲耶兰德，严格意义上的书店大致有五家，其中一家位于村子右口处，那里有个类似国内景点游客服务中心的机构，说是“机构”，其实就是在某家书店进门右边有一个值班人员，她就坐在一张书桌旁接受游客的咨询。这行人到书镇以后，就是先向她询问哪家书店英文的哲学书比较多些，因为他们当天要在晚上八点之前赶回卑尔根，必须在八点左右离开书镇，所以时间颇为“紧迫”，需要“有的放矢”。沿着村子的主道往里走几步，左侧峡湾边上一家大型的旧书店，但是这位书迷当时并没有来得及进去浏览，因为他要寻觅英文哲学书的那家书店在村子的最深处。等到那家书店，站在巨型书架之

间的中心过道上，他心中就浮现出了五月初在国内报纸上偶遇的那张照片，不禁有恍然如梦之感。

挪威的书店，越是非学术类的，越是挪威文的书籍居多。要在那里翻出些英文和德文的哲学书似乎并不容易，除了卑尔根大学和奥斯陆大学的书店，在这家二手书店里，这类书已经算是琳琅可观的了，但就哲学书架而言，也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格”，非常意外的倒是，这位书迷竟在那里找出了他二十多年前做博士论文时从北京图书馆复印过的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的《逻辑理论导引》英文版，原书初版于1952年，书架上的是1967年的重印本，虽然书的品相一般，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used book，因为前50页明显有仔细阅读过的划痕，但对于这位书迷来说，这已经是弥足珍贵的收获了。“眼尖”的他还找出了刚刚在卑尔根大学会见过的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的一部1980年代的小作品，题为《论合理性的草稿》。哲学类上被选中的书以小册子为多，只不过这类书多是普通的平装本。相反，在文学类上，他主要选了一些英语散文诗歌和文论读物，这类书多为有些年代感的小精装。淘书数十年的他颇为“精明地”对自己的学生说，这些书放在英语国家是大路货，但带到国内，简直就是精品了！兴奋地在某家书店翻找了两个小时，他得到的年代最早的书是一本精装的《圣西门和圣西

门主义》，出版于1871年。最有史料价值的书则有两种，一是《欧洲

的过去》，这是重评欧洲史的经典论文之汇集，分为上下两册；二是Charles Randall Barnes的《圣经词典》，是1900年的初版精装本，有1221页之巨，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圣经》的百科全书，却只有75挪威克朗！这就是国内所谓“白菜价”了。

初到书镇共逗留了两个多小时，也就看了这家书店的两三排书架，对资深书迷来说实在是于心不甘。大约两个礼拜后，这位书迷和他的学生又一次来到了这个书镇。由于交通的原因，也因为书店的营业时间，他们必须住在那里住上一晚，这可谓“坏事变好事”：正好可以一方面“缓冲”一下那种在书店“拼抢”的节奏，后者似乎本身就与寻访旧书活动之机理颇为不合，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再次感受下这个“世外”小镇的那种恬淡到萧索的意绪和氛围，在滚滚红尘中，视此机缘为可遇而不可求委实并不过分吧！

二次书镇行，说起来是整整为此花去了两天时间，但呆在书店里的时间也就六七个小时的样子，但因为比前次多出了两倍的时间，而且多去了两家书店，淘得书的“质量”似乎有了明显的“提升”。有一个例子是，有位国内的年轻朋友得知这位书迷将有书镇之行，就委托他留意下能不能找到吉拉斯的《新阶级的最后崩溃》。但是逛过旧书店的人都知道，对淘旧书者是基本上无法做此指望的，特别还是在挪

威语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没有对书籍的一种基本的敏感性和直觉力，多半会是令人绝望的无从下手从而无功而返，特别是在那种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取舍的巨大心理压力下。二次到书镇，书迷终于来到了前次没有来得及进去的另外一家学术型旧书店。虽然说了要“缓冲”下节奏，但到了现场却完全无法做到，一是书镇的书实在是太多了，必须尽快翻看；二是书店的营业时间太短，一般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最迟一家六点也打烊了。正是在这种冲刺般的高度紧张心态下，书迷翻到了一本《与斯大林对话》，刚翻了几秒钟，就决定收于囊中了。不管你还要消磨多久，书店都要关门了。待回到旅馆清点“战利品”，却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吉拉斯，那么，这位书迷是应该把这本书给他的朋友还是自己留下呢？

回到旅馆一会儿，就来了一支来自祖国的旅游团，于是寂静到有一些荒凉感的小镇就开始喧闹了起来。同胞们开始拍近景的峡湾，高处的雪山以及自己所住的这幢据说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房子。不意第二天一早用完三文鱼，同胞们就喜气洋洋地坐上大巴离开了，望着扬长而去的沃尔沃，书迷的那位一向爱“咬文嚼字”的学生忽然嘀咕了一句：同胞们，你们书镇已经歇业才到，书镇尚未开业就走，那又是所为何来呢？

2017年8月30日，返国前一日，卑尔根放晴